

專輯論文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上海疫情期間社區團購研究

楊涵庚、王琢玉

摘要

社會基礎設施這一研究視角關注不同空間憑藉其自身特性、工作方式能夠孕育何種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從這一視角出發，本文以上海疫情爆發期間的團購活動作為研究對象，關注社區微信群如何發揮社會基礎設施價值，並特別聚焦於目前我國社區社會關係淡漠、社會資本稀疏背景下的合作抗災實踐。研究發現，這些社區微信群發揮了「線上街道」的價值，幫助社區成員形成基於地域信任的弱關係來開展團購協作。弱關係中含有豐富的橋接型資本，進而提升了社區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以克服上海疫情期間「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的失調。在團購實踐進程中湧現出了社區公共人物，社區成員的公共意識提升，社區中的弱勢群體更好地得到了保護。並且，藉由微信的平台屬性，微信群作為社會基礎設施在修復上海疫情中物流基礎設施的同時

楊涵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社交媒體。

電郵：1974553867@qq.com

王琢玉，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計算傳播。

電郵：21210130037@m.fudan.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23年2月1日。論文接受日期：2023年8月8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也推動了微信平台的基礎設施化。本文強調在數位媒介於社會各領域飽和，越發打破線上線下空間二分的背景下，研究微信群等社交媒體作為社會基礎設施在調和線上與線下空間關係方面的意義。

關鍵詞：社會基礎設施、新冠疫情、微信群、平台

Special Research Article

WeChat Groups as Social Infra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Group Buying in Shanghai During the Epidemic

Hangeng YANG, Zhuoyu WANG

Abstract

Research on social infrastructure focuses on the kind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nurtur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diverse spaces. Based on this focus, this study explored group buying activities during the epidemic outbreak in Shanghai and focused on how community WeChat groups exemplified the value of social infrastructure, specifically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disasters in the context of in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rse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munity WeChat groups played the role of “online streets” and helped community members form weak-tie relationships based on geographical trust in collaborating to make group buying. The weak-tie relationships served to bridge capital, thus enhancing the community’s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reconciling the dysfunction of “space of flows” and “space of places” during the epidemic in Shanghai. Public community figures emerged from the group’s buying process, raising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community members and better protecting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Hangeng YANG (Master of Arts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social media.

Zhuoyu WANG (Master of Arts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7 (2024)

Moreover, as a 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 WeChat group contributed to the 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the WeChat platform while repairing the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during the epidemic in Shanghai.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media, such as WeChat groups, as a form of social infrastructure in reconciling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dichotomy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is increasingly dissolved with the saturation of digital media in all spheres of society.

Keywords: social infrastructure, COVID-19, WeChat group, platform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Yang, H., & Wang, Z. (2024). WeChat groups as social infra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group buying in Shanghai during the epidemic.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7, 91–120.

致謝

作者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第十六屆傳播學訪問學者計劃及工作坊」的專家以及《傳播與社會學刊》匿名專家、編輯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引言

自2022年3月28日起，上海市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實施核酸篩查，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先行進行封控，4月1日起，對浦西地區實施封控，開展核酸篩查。自此，上海的住宅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要求所有人員足不出戶，人員和車輛只進不出。保障基本生活必需的外賣、快遞等實行無接觸配送，不得進入住宅小區（澎湃新聞，2022a）。後上海陸續劃分封控區（「區域封閉，足不出戶，服務上門」、管控區（「人不出小區，嚴禁聚集」、防範區（「強化社會面管控，嚴格限制人員聚集規模」），2022年6月1日零時起，上海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澎湃新聞，2022b）。文中的「上海疫情」也指這一時間段。

疫情期間的封控極大地改變了上海居民的生活方式，首要變化是社區對於居民日常生活重要性的顯著提升。對於上海疫情封控中的居民而言，他們不僅需要通過社區居委等環節進行核酸檢測、登記取藥、了解社區疫情情況，並且也需要與其他社區居民以物換物、合作團購來共渡難關。然而，對於大都市的許多居民而言，社區此前只不過是他們工作生活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甚至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熊易寒，2019；謝靜，2019），因此在疫情之前，社區居民之間的社會交往和合作極為有限，人際關係稀疏和社會資本淡漠成為了很多社區的常態，這也給疫情期間社區居民之間必要合作的開展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另一重要變化則是上海疫情封控期間購買物資的困難性超出預料。由於無法外出購物，市民在封控初期自然寄希望於各大生鮮電商，然而由於需求的快速上漲和生鮮電商平台不少員工被封控管理等原因，導致末端運力不足，進而出現了「買菜難」的情況（沈欣悅，2022）。封控期間社區團購的流行一定程度彌補了如上困境。社區團購指居住在同一個社區或臨近社區的居民，通過與供應商溝通，約定起送份數後進行的採買行為。由於集中了同一社區的訂單從而減少了運力需求，允許靈活商定送達時間從而給予上海疫情中的企業更多準備時間等緣故，社區團購開始成為封控期間上海市民買菜的主要方式（楊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錦曦，2022)。社區成員依憑並建立了一系列社區微信群組，進而在線下空間活動受限的情況下，完成尋找參團成員、統計購買人數、協調取貨時間和取貨方式等一系列團購環節。

Klinenberg (2018) 意識到，社會資本的培育和社會聯繫的形成往往需要依靠特定的社會交往空間，並與這些社會交往空間的特性和工作方式息息相關。在災難期間，這些空間在促成社會合作、保護弱勢群體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價值，這些空間被他命名為社會基礎設施 (social infrastructure)。在社會基礎設施的研究中，學者更關注公園、商店等物理空間的重要性 (Klinenberg, 2018; Latham & Layton, 2019; Layton & Latham, 2022)。但疫情封控期間，居民在物理空間中活動受限的情況下，同樣需要形成社會資本和社會聯繫來促成抗疫協作，因此，本文從上海疫情期間的社區團購活動出發，探索社區微信群在災難期間發揮社會基礎設施價值的潛力，即經由這些社區微信群，社區成員此前既有的社會聯繫如何得到改變，進而如何幫助社區共渡難關，這一過程又與微信的平台屬性和「基礎設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 (Plantin et al., 2018, p. 295) 有何關係？

文獻綜述

災難與社區

在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部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1992, p. 27) 的定義中，災難指「對社會運作的嚴重破壞，造成廣泛的人員、物質或環境損失，超出受影響社會僅使用其自身資源應對的能力」。美國災難社會學家 Quarantelli (1987) 認為，災難與社會的系統脆弱性息息相關，不過，通過社會各方面的有效努力，社會也可以形成一種韌性來盡可能地降低災難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恢復社會的正常運行 (高恩新，2020)。

在2022年上海爆發新冠疫情期間，以住宅小區為單位的封控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常態，因此災難與社區的關係成為了本研究關注的問題。災難研究早已認識到，社區成員經常一起工作，從災難性的影響

中生存和恢復 (Norris et al., 2008; Quarantelli & Dynes, 1977; Ullberg & Warner, 2016)。災難首先是地方性的，是地方社區直接經歷的複雜事件和過程，當地社區處於災難第一線，必須處理災難的悲劇和多層面的後果 (Oliver-Smith, 1999)。在對美國密蘇里州颶風、土耳其馬爾馬拉大地震、日本福島核電站洩漏等不同災難的研究中發現，由於物質資源有限、救援隊等外界援助可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到達現場等原因，許多災民第一時間受到的援助往往來自當地的其他受災者 (Aldrich & Meyer, 2015; Quarantelli, 1960; Twigg & Mosel, 2017)。在社區抗擊災難的過程中，社會資本網路首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區的優勢也在這裏突顯，社會資本提供了獲得各種資源的機會，包括信息、援助、財政資源和兒童護理以及情感和心理支援，其中較高的結合型社會資本 (bonding capital) 可以轉化為居民之間更多的信任和更廣泛的規範；橋接型資本 (bridging capital) 則有助於獲得異質性的資源和信息 (Chu & Yang, 2020; Aldrich & Meyer, 2015)。其次，社區居民在地域上的鄰近性也方便了居民們展開合作自救 (Norris et al., 2008; Ahmad et al., 2022)，在外界援助無法到達時，內部互助成為可以獲取的唯一救助途徑，乃至出現了社區居民使用共同的資源，分享、交換和贈送禮物的「餘震經濟」 (aftershock economy) (Imperiale & Vanclay, 2016, p. 210)。同時，研究社區與抗擊災難的關係時，不應將目光僅僅局限於社區之內，也應關注社區內外各類成員和機構之間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如研究發現，社區恢復計劃 (community resilience initiatives, CRIs) 的形成不僅僅與社區內成員之間的互助溝通有關，也與社區外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大學等機構有著密切關係 (Fransen et al., 2022)。

在我國，社區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和管理單元 (陳娟、甘凌博，2022)，自1998年的住房改革以來，我國的社區從「單位制」社區走向商品房社區，封閉式的商品房社區開始成為城市主流的居住形態 (熊易寒，2019)。上海疫情期間的隔離管控大部分都是基於封閉式社區進行的。對比過往研究，這一社區形態變化延伸出了社區抗擊災難的新問題：即我國伴隨著住房的商品化和人口流動的多元分化，商品房社區中成員的異質性較高，社區成員彼此之間的聯繫和對社區活動的參與都相對有限 (張振、楊建科，2017；賀霞旭，2019；蔡禾、賀霞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2014)，社區成員也趨向於原子化，相互之間社會資本稀薄，信任程度不高。尤其是上海疫情期間的管控雖然以社區為單位進行治理，但是多數居民都保持一種「足不出戶」的狀態，社區成員儘管在地域上臨近，但互助交往卻大大受限，甚至可能因疫情進一步加劇本就原子化的社區成員之間的恐慌和不信任(田毅鵬，2020)。學者閔岩(2021)認為互聯網便利了災民恢復各種既有的社會聯繫，使得以空間地理為基礎的社區自救更為便捷、順暢，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社區成員的活動或許將更為依賴各種社交媒體技術。而近年來興起的社會基礎設施的概念同樣關注社區中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如何通過特定空間得到培養，進而更好地應對災難的問題。因此，本文以社會基礎設施的視角關注上海疫情期間的社交媒體實踐，試圖回答這一問題：上海疫情之下，社交媒體是如何幫助社區成員從物理條件的封控中建立聯繫，進而走向一種互助合作的物流實踐的？

社會基礎設施與社交媒體平台

何謂基礎設施，Larkin(2013)認為，基礎設施是建成的網路，促進貨物、人或思想的流動，並允許它們在空間上交換，而「城市的真相就在流動中」(Kostof, 1992, p. 305)。從這個角度來說，基礎設施沉入其他結構、社會安排和技術的內部(Star, 1999)，形塑和支援著城市的日常生活方式。談及基礎設施，人們常常想到硬性的、耐用的和運行良好的系統或者服務，比如電網、水利、道路等等(Edwards, 2003)。當然，基礎設施也包括連接各種異質性系統的分類標準、規則等(唐士哲，2020)。不少學者認為，當基礎設施穩定運行的時候，它往往是「黑箱化」的(格雷厄姆、馬文，2020：19)，對於用戶來說是不可見的(張磊、賈文斌，2021；Star, 1999)。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關注由於災難、欠發達等原因導致基礎設施支離破碎，運行不穩定、不標準時，大量的人類工作是如何促使基礎設施發揮作用、乃至在一定情況下如何替代更典型的硬性基礎設施系統的(Anand, 2011; McFarlane & Silver, 2017)。學者Klinenberg(2018)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認為，當發生重大災難時，無論如電力、交通網絡等硬體基礎設施的技術或設計多麼複雜，災難對其的影響都不可能完全預防，此時，人們更需要建立社會聯繫來應對正常社會生活的中斷，而這種聯繫的建立需要特定的空間作為基礎和支撐。進而，Klinenberg (2018) 提出了社會基礎設施的概念，社會基礎設施是指為社會聯繫創造條件的空間、設施、機構和團體網路，如圖書館、學校、公園等允許人們聚在一起、進行各種交往活動的物理空間 (Latham & Layton, 2019)。社會基礎設施這一概念關注的不是作為社會整體的城市，而是社區和街道的集體公共生活，Klinenberg (2018) 在書中引用 Dewey (1946, p. 213) 的觀點：「社會聯繫的前提是密切而直接的交往和依戀的活力和深度」，並認為這種交往和依戀的形成正是因為人們基於社會基礎設施展開的集體公共生活。同時，通過這樣的交往也可以產生「社會剩餘」(social surplus)：即從社會基礎設施的共用使用中，社會成員有可能形成公民文化和集體生活的品質 (Amin, 2008, p. 8)。學者們考察了市場、咖啡館、公園等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物理空間是如何憑藉自身特性促進了不同種族、貧富狀況的多元人群展開有效的社會交往，形成社會聯繫 (Jones et al., 2015; Koch & Latham, 2012; Layton & Latham, 2022)，這些研究也體現了社會基礎設施研究的視角——即探索這些空間本身的特性及工作方式，考察這些空間接納/排斥了哪些群體，以及這些空間促成了怎樣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

通過社會基礎設施培育的各種社會資本和社會聯繫，能起到強化社區韌性的價值，對於社區抵抗災難有著重要意義。例如在芝加哥的熱浪中，弱勢人群能否生存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是他們能否使用社區和街道中一系列安全和有效的公共和準公共空間 (Klinenberg, 2015, 2018)。這些空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支援安全的社會生活，比如給予弱勢群體空調等服務、幫助他們互相聯繫、互相照料等等。然而，新冠疫情中封控所帶來的最大問題在於物理空間成為一種不可多得的資源，社區成員必須依靠社交媒體等線上手段形成聯繫。本文針對疫情的研究試圖對話社會基礎設施這一概念，並對其進行延展。儘管提及了幫助性少數、難民等群體建立社會聯繫的案例，Klinenberg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2018)總體上認為社交媒體難以成為有效的社會基礎設施，因為脫域的社交媒體中的社會交往與街道和社區等物理空間中的社會交往是對立的，並且個性化推送等技術往往加劇了信息繭房和社會撕裂等問題，無助於異質性社會成員開展社會交往。他缺乏考慮近年來伴隨著一些社交媒體平台化的進程中，社交媒體已經滲入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為一種基礎設施，以其自身的性質改寫了既有的現實空間和社會關係(孫萍等，2021)。新冠疫情期間，各種「平台」作為基礎設施，在協助家庭、政府、企業以及社區應對疫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席志武、李輝，2021)。

微信是社交媒體平台開始走向基礎設施化的最典型例子之一，一方面，微信憑藉其熟人社交的底色，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社會關係中，進而實現了用戶線上線下生活場景的高度融合，使用戶的學習、工作、公共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於微信群等空間開展。另一方面，微信不僅強化自身社交、二維碼、支付等功能，並且正如Andreessen(2007)指出，平台首先是一種可程式設計的基礎設施，微信通過開放自身的可程式設計性(即提供API介面)(東開榮，2020)，使得政府機構、企業以及社會組織等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小程序以及協力廠商應用等方式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活動，微信平台上海量的用戶以及其中寶貴的強弱社會關係，成為吸納這些行動主體進駐其中的原動力之一。微信也在這一過程中，憑藉自身的底層控制結構，吸納不同行動者在平台之上源源不斷產生的數據，通過這些數據實現其價值的增長和邊界的不斷擴張，如今，微信已經作為一種跨越了社交、商業、新聞等諸多領域的社交媒體平台，具有超強用戶吸附性(Chen et al., 2018)。對於用戶來說，買東西要用微信支付、做核酸要靠微信的核酸碼、辦事要靠政務小程序，微信成為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礎設施，改寫著社會各領域的運作形式，因此，以微信為代表的諸多社交媒體平台已經不僅僅是Klinenberg在過去所談論的脫離物理環境的虛擬關係遇會場所。以社區為例，社區在傳播中構成(謝靜，2015)，而當一種新的媒介平台不斷滲入社區的日常生活時，社區的邊界、組織形態、交往方式等性質也必將被改寫，比如，社區成員可以在社區微信群中相遇，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通過分享微信公眾號的新聞信息、利用小程序和協力廠商應用程式展開交易等方式進行社會交往。在上海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已經有研究注意到微信群在應對社區公共事件、開展商業活動方面的價值(邵春霞，2022；Chu & Yang, 2020)。

因此，考慮到社會基礎設施對於街道和社區的社會交往及災難應對的重要意義，以及社交媒體平台不斷基礎設施化的背景，本文以促成社區團購開展的社區微信群組為研究對象，將依次回應如下問題：這些微信群組如何在既有社區的基礎之上形成新的社會交往空間？這一空間有何特點？這些群組是否帶有社會基礎設施屬性，從而有助於社區成員培養社會聯繫，進而面對災難展開有效的社會合作？這些微信群組與物理空間的社會基礎設施有何區別、與社交媒體的平台屬性和基礎設施化進程又有何關係？本文選擇上海疫情期間的社區團購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在於，首先，上海疫情期間「足不出戶」成為常態，傳統意義上社會基礎設施理論所倚仗的物質空間變得不再可得，但團購的開展又需要居民建立有效的社會聯繫、形成社會資本，因此社交媒體在此期間的重要性得到突顯。其次，團購不僅僅牽涉到社區居民線上的溝通，也涉及線下物資的流通和運輸，並且在團購開展的過程中，以「快團團」、「拼多多」為代表的小程序開始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以團購為研究對象，有助於進一步探索社交媒體在線上線下高度融合的背景之下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潛力和特性，及其與社交媒體的平台屬性及基礎設施化進程之間的關聯，這一研究對象對於本文的研究問題具有典型性。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圍繞自2022年3月28日開始，上海市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實施核酸篩查，直至同年6月1日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期間所進行的上海社區團購活動。在社區團購開展的過程中，團長這一角色需要聯繫外部貨源並與社區成員聯繫協作，往往處於一個同時能夠了解社區內外情況的特殊位置，因此，2022年5月至9月期間，研究者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20名團長進行了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採用滾雪球的方法尋找受訪對象。其中，有九名團長表示自疫情封控初期至上海6月1日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的這一段時間裏，幾乎一直參與到社區團購的工作中去，他們提供的信息有助於研究者了解團購活動開展的全貌。所有訪談以線上方式進行，時間集中於35分鐘至70分鐘不等，主要問題圍繞團購的開展集中於兩部分：一是社區團長如何聯繫到外部貨源並將信息帶入社區微信群中，二是社區微信群的建立及社區成員在其中協作互助的情況。此外，為了了解通過上海疫情期間的團購活動社區成員之間建立的聯繫和紐帶在封控後情況如何，研究者於2023年3月至5月對其中的10名團長進行了回訪。同時，在整個研究週期內，研究者還對30名參與疫情封控期間社區團購的團員進行半結構化的訪談，希望能夠補充研究的視角，訪談時間集中在25分鐘至60分鐘不等，問題主要集中於疫情封控中及解封後，社區成員圍繞團購在社區內部的聯繫和互助情況。在選取受訪對象時，本文考慮了團長及團員所在城市區域以及居住社區類型的多樣性因素。受訪者分別來自上海浦東、楊浦、青浦、長寧、閔行、徐匯等區，社區類型涵蓋公寓型、內環弄堂型、商品房及以老公房為主的老舊社區。居住在老舊社區的受訪者普遍表示，社區中老年人口較多，在封控中如何幫助使用手機不便的獨居老人獲取物資是社區面臨的一大問題。

社區微信群：「流動空間」中的「線上街道」

微信是中國用戶數最多的APP之一(艾媒諮詢, 2023)，並且微信如基礎設施一樣(Plantin & de Seta, 2019)，成為用戶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微信也就自然成為了上海疫情中用戶在組建群組建立聯繫時的首要選擇。微信群只能通過好友邀請、掃群邀請碼等方式添加，因此這些群組往往建立在各種預存的社會聯繫之上，具有邊界的可控性的同時，也可以藉由這些社會聯繫快速擴散。上海疫情爆發初期人們進入社區微信群組的主要方式有三種，一是通過社區成員之間的相互介紹和邀請，其中如社區居委工作人員和樓組長等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關鍵人物，因為職責原因（如組織檢測核酸等），能在封控期間接觸到大量社區居民，因此在社區群組的擴散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正如多位受訪者表示，疫情爆發初期一些社區居委工作人員、樓組長、個體群主等選擇將社區群的二維碼列印張貼至社區公告牌、樓洞口等醒目位置，供社區成員在封閉前數日及封閉後在進行核酸檢測等活動的下樓間隙來添加，加快了群組的擴散速率。三是也有少數社區在疫情封控前就有部分社區成員參與的社區群，疫情初期則以這些群組為基礎形成了更大規模的社區群。借此，在上海疫情期間，社區中的個體雖然被封閉在家中，卻經由大大小小的社區微信群為仲介，形成一套在封控時社區居民之間廣泛聯繫、及時通達的信息網路，居民獲取疫情信息、團購、尋求幫助等日常生活的種種活動也需要在社區群中開展。而團購群則是這些群組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報導，在疫情封控中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社區團購已成為上海市民主流的買菜方式之一（楊錦曦，2022）。

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2006: 104) 認為，「即使對於一個最具城市化的人來說，不管在街道外面有多少選擇，他們的日常生活仍然依賴於他們所在的街道」，而社區鄰里之間社會聯繫的生成和社會資本的累積則與人們在這種日常生活中更平凡的互動有關，通過這種互動，有助於形成街道上「公共尊重和信任的網路」。因此，街道可以視為城市鄰里層面發展的一種催化劑，也就具有了社會基礎設施的屬性。而疫情封控期間，成為了開展社區互動重要空間的微信群有著與街道相似的特性。具體來看，瓦爾 (Martijn de Waal) (2018) 總結雅各布斯的觀點，認為街道之所以能支持社區鄰里在日常互動中培養社會聯繫和積累信任，主要是因為以下特性，而這些特性同樣在社區微信群中浮現出來。首先，街道要成為一個居民經常相遇和會面的平台，並且居民必須有理由使用潛在的聚會場所，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斯強調這種街道中社區居民的日常活動應具有向不同收入、種族、教育背景街道成員的開放性。而社區微信群不僅承載了團購、信息交流等諸多封控期間的社區居民的活動開展，也有著向社區背景多樣化的成員開放的特性，因為微信團購群需要湊夠團購起送的固定訂單份數、吸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不同成員擁有的豐富社會資源來獲取更多團購渠道。再者，需要有效的「過濾機制」來幫助社區關係和信任的蓬勃發展，在這其中一些可識別的「公共人物」在鄰里間也發揮了積極協調的作用。在疫情封控期間，許多社區微信群呼籲群成員將自己的暱稱改為自己所居住的樓戶號，來進一步強化通過已有社會聯繫來添加的社區微信群的邊界感，濾去社區生活無關人員，在社區群建立伊始，團長、志願者等作為社區活動開展的關鍵人物，在社區群中也發揮了協調社區成員關係和維持群秩序等相關作用。最後，街道在「鄰里的私人、地方和公共空間之間達成某種統一是很重要的」(瓦爾，2018：23)，需要避免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生活的時候被過多干涉個人生活從而產生不愉快，保障多元化的鄰里之間相互尊重和包容差異。而在團購群中，多元化的群成員之間的溝通主要是為了合作來更好地促成團購活動開展，因此他們很少也不需要互相問長問短，探聽別人隱私。因為這些特性的相似性，社區微信群具有發揮「線上街道」的價值以及支持疫情封控期間的社區生活中社區成員之間交往協作的潛力。

但是，僅僅是傳統的社會基礎設施很難幫助封控中的上海居民採買更多的生活物資，原因在於，封控中居民購買物資的主要挑戰來自城市物流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從而導致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和「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 (卡斯特，2001：468)兩者之間關係的失調。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2001：569)認為，在「網路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中，形成了經由信息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所支撐的、跨越地域在同一時間聚攏社會實踐的「流動空間」，這一空間將地方的邏輯和意義吸納其中。但處於疫情封控中，「地方空間」和「流動空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信息傳播和交通資源的不對稱性。一方面，在疫情封控初期，以盒馬、叮咚為代表的大型電商平台，以及以上海發布及各區發布、一些大型食品品牌公眾號為代表的傳播者，雖然有著豐富的信息傳播資源和渠道，能夠將物資購買的有關信息廣泛撒播出去，但是，當這些平台的信息廣泛觸達受眾時，這些平台卻沒有相應的運力資源來滿足受眾的物資需求，因此這些信息的傳遞在真正轉化為物資的保障時會遇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到困難，這也導致了這些運力不足的電商平台及大型食品公司不得不根據運力局限、搶購先後等情況分配購買名額，最終居民所感受到的就是封控區域買菜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疫情封控初期，一些農戶、供應商、社區店等分散的、擁有保供資質和運力的貨源，卻因為缺乏如受到廣泛關注的微信公眾號、平台等信息渠道來有效地和社區居民對接，導致物資流通受限。因此，伴隨著疫情期間的大範圍封控，「流動空間」無法有效地將「地方空間」完全納入自己的邏輯之中，那麼，「線上街道」催化了社區怎樣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的形成，又是如何作為仲介調和「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之間的關係呢？

社區群中的社會聯繫：從基於地域的弱關係出發

卡斯特(2001: 444-445)認為，「互聯網特別適於發展多重交疊的弱紐帶」；弱紐帶正適合促使具有不同社會特徵的人群相互連接，使人們的社會交往得以擴展。在訪談中同樣發現，社區團購群中很少擁有如親戚或友情這樣的強關係，這也與我國的住宅小區中社會成員之間原子化程度較高、社區成員背景日趨多元的情況相符。但是，由於疫情封控導致居民生活大幅回歸社區以及共同面臨的外界壓力風險，使得居民在社區團購群中的交往也變得格外頻繁，因此這些作為「線上街道」的微信群組加速催化了社區居民之間的弱關係，並且，與卡斯特所說的弱紐帶的不同之處在於，社區團購群中的成員雖然以弱關係為主，但是由於同在一個小區的地域基礎，更容易培養彼此之間的信任，這種信任幫助社區居民在應對團購的時候更為放心，社區成員不僅在線下，在微信群中也是「抬頭不見低頭見」，有甚麼事情就可以找到負責人，正如團長4談到，「社區是個小社會，你住在哪我都清楚的，不清楚打聽幾個人也就清楚了，所以這個時候相對來說會有一些自律」。

弱關係中往往蘊含著豐富的橋接型資本(Granovetter, 1973)，而橋接型資本能夠提供各種資源(Aldrich & Meyer, 2015; Chu & Yang, 2020)，微信團購群中的橋接型資本提供的兩種類型的資源格外重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首先，當上海疫情期間商家尋求與社區建立聯繫，而社區需要購買渠道的情況下，本就多元化的社區微信群組成員將自身豐富的關係網絡中對團購有幫助的部分(如從事餐飲、零售等行業的社區成員擁有的工作關係、一些社區成員的熟人提供的團購渠道等)帶入社區微信群組中，使社區群組在不至於混入過多社區外的人員導致基於地域的信任被破壞的情況下，吸納團購渠道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強，比如團長14、19表示：

因為我在百貨行業，然後我之前比較喜歡交朋友，所以基本上可能很多種圈子能幫上忙……比如我就幫助一些商超來搭網，進而幫助很多團購的資源進入社區。(團長14)

後來我就聽說(某大型商超)可以一對一的對周邊的這種小區進行特供，然後我剛好平時是在這家商超裏的一家瑜伽館裏面練瑜伽，我就問館長能不能幫我推薦一下商超的店長的微信，然後就聯繫上了。(團長19)

尤其在疫情封控初期，由於貨源渠道不穩定、社區缺乏團購經驗等原因導致社區購買物資的價格和品質不穩定時，一些擁有更好的貨源和團購渠道的社區成員為了滿足自身和鄰居的需要也分享了自身的渠道來提升團購的品質，比如團長6表示，由於封控初期自己買到了一批品質非常差的蔬菜以及了解到一些團購的渠道存在貨源風險：「外部一些有通行證的司機會賣一些用塑料袋包裝的散稱豬肉，完全是沒有資質、沒有檢疫報告的，因此也不敢吃」，從而決定去聯繫更加放心的團購渠道並作為團長開啟團購。

但是，僅僅有信息是不夠的，團購的達成不僅需要購買人數達到起送份數，在一些場景下，也需要社區內的不同成員貢獻團購各環節需要的資源和優勢，如帶孩子的全職家長擁有時間靈活性優勢、年輕人對社交媒體的擅長及體力的優勢、其他群成員可能擁有的資源和閒置時間等等。隨著團購活動的開展，越來越多的居民在協作中也樂於分享自身的資源和能力，比如團長3的社區中有成員通過幫忙製表來支持團購活動，而團員16表示，團購過程中一些小拖車、袋子也是需要鄰里之間協調的：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在群裏面大家都會說你這樣是不是工作量太大了，太辛苦了，我來幫你弄個表，大家鄰居都互相理解一下，在表單核對一下各自的信息，看看自己要的物資有沒有少的多的。(團長3)

團購的一些其他的配套設備可能要互助，比如說小拖車這些東西……團購的那些菜到小區以後是一堆的需要分發，甚至連塑料袋都是要協調的。(團員16)

經過短時間內多次團購合作，一些參與團購的社區成員之間的關係也從弱關係進一步發展，配合更為嫻熟並對各自的能力和為人更加了解，進而，這些「線上街道」在團購協作中形成了更多的相互尊重和信任，藉由這種尊重和信任，一些社區出現了基於不同社區現狀、更為組織化和模式化的團購運作。比如團長19所在的社區就形成了一個比較固定的團購志願者體系：「我們的團購志願者發展成了一批固定的人，一棟樓是一至兩名志願者，如果物資比較多的話，這兩名志願者再找自己樓棟內部的一些其他志願者過來幫忙」。這些團長和志願者不僅共同協作，也開始共同承擔責任，「有了固定的人員以後責任就比較好落實，如果分發到居民手中的物品出了問題，最後團長、志願者都是要承擔一部分責任的」。並且，這些「線上街道」湧現出了「街道公共人物」，即對於公共事務有著足夠的興趣，經常與眾多人群接觸的人物，一些公共人物還身懷各種特殊技能(雅各布斯，2006：60-61)。在以這些公共人物為中心的努力下，其所在社區的團購開展變得更加系統，比如以團長4為代表的一批熱心團長在社區建立了「團長的團長」機制，制定社區團購自律規則並指導其他團長進行消毒等團購操作：

我參與了幾次團購發現了一些問題之後就把它優化了，形成一些流程，然後我在在線共享文檔建了一個群，大家都可以看，並且做了排期表，這樣大家就知道聯繫人該找誰，物業該找誰，車子該找誰。

團員26則因為自己的職業為工程師，對管理流程感興趣，因此牽頭制定了社區的「社區團長須知」、「商品派發明細清單」、「團購取貨流程」等組織公約，而居民相互之間的尊重和共識則促進了這些公約的落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我覺得(在團購方面)要導入一下與公司管理方面相對應的一個機制……這些東西都只是一個公約，沒有強制的手段一定要執行，也是需要居民們去配合的。

除了社區團購的流程隨著社區成員的熟悉而不斷優化和完善之外，社區成員也開始以團購相關的活動為契機彼此溝通，進而發展出更多互助行為，比如像受訪團員29提到的，「(鄰里之間)有換過東西，然後還有買多了可能會分一分」。團長6在互助中體會到了社區居民的多元性：「發現小區裏面隱藏的大神有開飯店的，他會分享很多東西的做法，有開理髮店的可以幫大家剪頭，然後各行各業的人出來了，幫助大家解決了很多事情」。

並且，Klinenberg (2018)認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價值在於當災難來臨的時候能夠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支援和保護，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基於社會基礎設施所形成的相互聯繫和關心能有效降低災難期間老年人被遺忘和忽視的風險。在上海疫情期間，人們同樣通過圍繞社區微信群的團購生活形成了支持和關心老年人的社會聯繫。為了使老年人有能力參與團購和購買自身需要的生活物資，一些社區的熱心成員積極幫助老年人提升使用微信的能力，比如團長14所在的社區老年人比例較高，因此她談到：「老年群體比例較大會導致有一個問題，他們不太會在網上開拓物資渠道」。她除了積極聯繫團購以外，還錄製了短視頻來教會老年人一步一步的完成團購。並且，一些老年人因為參與團購所習得的相關微信操作技能，也幫助這些老年人在疫情封控之後更好地運用微信展開日常生活，而這也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了微信的普及程度。對於使用團購相關的微信功能不方便的老年人，為了幫助他們有效購買、獲得物資，不同社區也採用了各種方式，比如團長10表示：「我們這棟樓(高層)我印象中大概有四至五名老人，確實不會用手機，也不會用微信，最多只能用老人機，那就由他們的子女幫助他們進行聯絡、團購等等」。而團員27所在社區的一位團長並不居住在該社區，但以幫助居住在該社區的外公外婆更好地滿足物資需求為契機成為了該社區的遠端團長，豐富了社區的物資供應。也有如團長6所在的社區主動統計老年人的物資需求情況：「我們小區就是很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多年齡大的獨居老人，他們的生活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我們發現老人不會用『快團團』和『群接龍』之後，立刻就組織去摸排老人的信息，然後列成表格來幫助老人去訂牛奶」。

綜上，上海疫情期間發揮了「線上街道」價值的社區微信群成為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基礎設施，儘管雅各布斯認為，時間是促使街道中的社會資本在街道居民的日常交往中積累下來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上海疫情期間，居民之間在「線上街道」中的交往頻率遠超於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於街道等空間參與的頻率，因此在有限時間內加速催化了一些社區成員之間關係和信任的發展，這些關係不僅促進了社區團購的組織變得更加系統化，也推動了社區成員之間互助行為的發生。不過，儘管受訪者普遍認為，若社區面臨新的外部壓力和風險時，這些微信群孕育的社會聯繫和資本也可以重新被啟動，強化社區的應對能力，但是在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後，這一短時間內培養起來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發揮價值的場景也十分有限，儘管個別受訪者提到了改變的發生：「因為團購的時候，大家在小區群裏面的發言比較多，所以現在對小區裏面的一些事情如需要改進的現象，過去大家不好意思說，現在有時候大家就在樓棟群裏或者在小區群裏發個言，接著經常有回饋和溝通」（團長2），但受訪者普遍認為，上海疫情後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與社區及鄰里的交集逐漸降低，也有一些租戶搬離社區，居民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越發疏遠，就像團長2接著提到，「當時接觸比較多的人，現在有時候會在微信上有一些互動，但是也因為時間的推演也又淡了很多」。同時，一些受訪者也借參與疫情封控期間的團購互助合作的契機，擴大了個人的交際網路，比如團員26提到，「那時候認識了一批朋友以後就一直聯繫到現在，等於多了一個朋友圈的範圍」。

並且，與線下的街道及其他物理空間的社會基礎設施所不同的地方在於，社區微信群依憑其上培育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不斷藉由社區成員的人際關係吸納社區外網路中豐富的信息和資源並通過協作來使其轉化為團購行為，使社區變成一個具有強大的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的節點，進而調和了新冠疫情等災難中由於人員、物資流動困難而使「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關係失調的情況，更好地促進在一種線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上線下高度融合的「信息化社會」中的社區生活，這也是探究社交媒體平台發揮社會基礎設施潛力的意義所在。當這樣的社會基礎設施建築於日益平台化的社交媒體之上時，社交媒體的平台屬性和社會基礎設施的運轉產生了相互影響，下文將展開闡述。

實踐的基礎設施：當社會基礎設施與平台相遇

基礎設施是城市穩定運行的基礎，當災難、資金、地區發展水平有限導致基礎設施失靈時，為了保證城市生活的繼續，人們會圍繞維持基礎設施的原有功能展開一系列的實踐活動，基礎設施成為了「在維持城市生活的社會物質關係中連接人和事物的一種實踐」(Lawhon et al., 2018, p. 725)，即「實踐的基礎設施」。在上海新冠疫情期間，由於居民被封控在家中，導致城市原有的物流基礎設施無法正常運轉，因此社會成員也需要圍繞斷連的物流基礎設施形成新的社會組織和實踐模式，並使其盡可能穩定運轉，進而彌補原有的城市基礎設施的功能缺失。

儘管封控期間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微信群孕育了大量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但在團購實踐開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兩方面的困難。首先，從社區內部來說，團長需要穿梭於不同群組發布自己製作的團購消息、時刻留意是否有新的成員參與團購、自己製表來統計參與團購人員的詳細信息以及分別收款等，而這些工作極大地佔用了團長有限的時間精力。其次，社區團購牽涉到社區如何與外部各類商業主體建立穩定聯繫，進而修補疫情封控下破損的城市物流系統。但訪談得知，封控初期社區團長聯繫外界貨源要麼依賴於通過個人關係結識的零售商、農戶等資源，要麼搶購大型企業、保供單位以及各區微信公眾號發布的團購物資，然而這兩種模式的穩定性有限，並非所有團長都有豐富的個人渠道來聯繫社區成員需要的各類貨品。

隨著封控期間社區團購模式的發展，主要以「快團團」(拼多多旗下的小程式)以及「拼多多」為代表的小程式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社區所採用。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小程式作為闡道以鏈接的形式穿梭在不同的

社區微信群中，促進了封控期間物流基礎設施運行的再標準化，形成了一種災難中「實踐的基礎設施」。

在基礎設施研究中，閘道指將不同異質性系統連接在一起使其實現標準化和協同運作，進而形成基礎設施網路的一種仲介轉換機制 (Jackson et al., 2007)。基礎設施往往起源於一些端到端的異質性系統，再通過閘道不斷連接並標準化這些異質性系統，如電力在成為基礎設施的過程中需要通過變壓器等技術設備串聯起不同的電網，互聯網則需要 TCP/IP 等協定連接不同設備和系統，實現相互相容。而在微信平台基礎設施化的過程中，平台的特性在於借助自己擁有的用戶基數和用戶間關係優勢，通過小程序等閘道開放自身的可程式設計性，從而將各個行業豐富的行動者吸附於平台之上，其在利用平台的用戶基數及社會關係網路進行商業等活動的同時服膺於平台底層的技术標準以及數據流動協議。借此，平台完成了向社會各個行業的拓展。研究發現，上海疫情期間社區團購從野蠻生長逐步走向標準化的道路也暗合了平台基礎設施化的邏輯。

上海疫情封控期間，「快團團」和「拼多多」的好處在於，它們作為閘道，把微信建構成了一個連接多元的賣家系統和社區團購系統之間的標準化連接平台。經由這一平台，團長尋找貨源、報價溝通、付款等端到端的異質性團購流程被這些小程序標準化了，團長只需要在小程序上聯繫貨源進行溝通，談妥後將小程序鏈接轉發至團購群中，參與團購的社區成員在小程序中接龍付款即可，或者即便團長有自己穩定的貨源渠道，也可以經由「快團團」組織團購來省去由於統計團購人員及其住址、收取團購費用等繁瑣且不穩定的流程，建立標準化的團購模式。但是受訪者反映，這些小程序並不能完全取代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微信群組的價值，因為，雖然「拼多多」等小程序允許社區成員直接點擊社區群中的鏈接，登記自身住宅地址，付款後即可完成團購，但是小程序並不會幫助使用者協調貨物運送時間、協定卸貨地點、分揀消毒貨物、通知用戶取貨……換言之，社區團購開展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根據所在社區情況，由團長與參與團購人員協作，通過微信群協調從發布鏈接購買到組織收貨等一系列步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浮現出了社會基礎設施與微信的平台屬性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在上海疫情期間的團購活動中，經由微信小程序作為闡道，引入了標準化的操作模式來強化將社區群中孕育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轉化為團長與其他社區成員開展團購實踐的能力，小程序也提升了社區與外界其他系統建立更為穩定的聯繫的能力，促成了一種「實踐的基礎設施」來修補由於封控而失靈的城市物流基礎設施，使城市疫情封控期間的生活也相對穩定了起來。另一方面，基於微信的平台屬性，這些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微信群所產生的大量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被平台迅速吸納，並使得諸如「快團團」、「拼多多」等商業主體更加依賴於微信平台，微信也借此強化了自身作為一種基礎設施在社會環境變化中的適應性，更為深度的嵌入並支持了疫情封控期間的商業生活和社會運轉。

結論

社會基礎設施這一概念關注如何通過有效的社會空間和場所，來支援社會成員在參與街道和社區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進而保護脆弱的社區。通過對20名上海疫情期間的社區團長及30名參與的團員的深度訪談，本文發現作為「線上街道」的社區微信群組同樣具有社會基礎設施的屬性，憑藉其基於地域而不囿於地域的開放性特點和面向多元異質社區成員的包容性特點，推動了疫情封控期間社區成員的交往，形成了基於地域信任且蘊含豐富橋接型資本的弱關係，並為封控期間社區團購的開展提供了基礎。在社區微信群建構和團購開展的過程中，湧現出了社區公共人物，並且社區成員之間的信任得到了提升、社區的老年人在災難中得到更好的保護，這些社會基礎設施因而強化了社區的韌性。同時，這些社區微信群組也在以下兩方面體現出了不同於物理空間的社會基礎設施的價值，也對未來進一步研究社交媒體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潛力帶來了啟發。

首先，社區微信群作為一種上海疫情期間的社會基礎設施，不僅促進了社區成員之間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的形成，而且在不破壞社區微信群基於地域邊界形成的信任的情況下，將社區成員豐富的個人關係網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絡中有助於社區應對災難的部分帶入社區之內，進而極大地強化了社區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卡斯特(2001: 25)認為在「網路社會」中，信息的生產、組織和傳遞能力至關重要，而社區群也因此強化了社區的韌性，並調和了上海疫情封控期間「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的失調情況。因此，面對線上和線下日趨融合的「信息化社會」(informational society)發展趨勢，需要將社會基礎設施研究視角從物理空間拓延至社交媒體，如關注當災難來臨時，社交媒體等新型社會基礎設施如何對線上線下融合關係的破損進行修復，進而藉由網路彙集資源來保護社區及其中的弱勢群體，維護正常社會生活的開展。

其次，在災難中，平台之上的社會基礎設施在彌補了其他基礎設施運轉的同時，也推動了平台基礎設施化的進程。在上海疫情中，微信的平台屬性與微信群組的社會基礎設施屬性相互影響，一方面，作為闡道的小程式強化了將微信群組所孕育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轉化為抗擊災難等實踐活動的能力，進一步彌補了疫情期間物流基礎設施的斷連，另一方面，微信也迅速吸納了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來強化平台之上的其他商業等活動主體對其的依附，也推動了自身作為一種基礎設施來適應社會狀況變化的能力。如今，學者們注意到伴隨著平台的基礎設施化，平台與公共利益之間的聯繫越發緊密(劉戰偉，2022；張磊、賈文斌，2021；Plantin et al., 2018)，但是當疫情等災難發生時，如何處理好平台的公共利益和商業屬性之間的關係需要展開進一步的研究，而社會基礎設施這一視角對公共利益的探討為這種關係的研究帶來了啟發。

本文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不足，值得學者在未來進一步拓展研究。首先，儘管疫情封控期間團購的風險在社區成員採取的措施和政府監督中得到有效降低，如社區成員基於地域的信任、社區團購自治規約的形成、團長們物資渠道的不斷提升等等，政府部門通過實行「三證」(指上海市商務委頒發的〈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資保障企業證明〉、上海市防疫保障物資臨時通行證，以及配送人員及貨車司機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等相關規定來加強對團購的監管，但仍出現了一些團長運用其信息等資源的不對稱優勢來謀取暴利的情况。也有一些團長反映，開展團購的相關平台缺乏完善處理團購中買賣雙方糾紛調解、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仲裁和售後的機制，使得團長需要面對的風險提升。並且，一些社區自治能力的不足導致了居委、志願者、團購居民發生摩擦等情況。因此，如何有效及時地規約和應對災難期間新興商業模式的風險仍然值得進一步研究。其次，儘管受訪者普遍表示疫情期間通過團購等形式協作的經驗有助於社區更好地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壓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這些互助中形成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能夠發揮價值的場合相對有限，因此如何在常態下挖掘這些社區中累積社會聯繫和資本需要進一步研究。最後，不應忽略作為本文研究背景上海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特大都市，在新媒體技術普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同時即便在上海內部，一些較為富裕的社區也在團購選擇方面有著更多空間，能購買到更奢侈的商品，因此也應進一步關注當不斷基礎設施化的社交媒體平台嵌入規模、發展水平各異的城市乃至經濟水平不同的社區中時，將會對城市中微觀的社區成員關係及協作乃至宏觀的物流等基礎設施系統及牽涉到的相關的政策規定等方面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田毅鵬 (2020)。〈治理視域下城市社區抗擊疫情體系構建〉。《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頁2、19-27。
- Tian Yipeng (2020). Zhili shiyu xia chengshi shequ kangji yiqing tixi goujian. *Shehui kexue jikan*, 1, 2, 19-27.
- 艾媒諮詢 (2023年2月10日)。〈艾媒金榜 | 2022年度中國APP月活排行榜出爐，前三名幾乎難撼動？〉。百度網。上網日期：2023年4月25日，取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405835090661656&wfr=spider&for=pc>。
- Aimei zixun (2023, February 10). Aimei jinbang | 2022 niandu Zhongguo APP yuehuo paihangbang chulu, qiansanming jihu nan handong? *Baidu wang*. Retrieved April 25, 2023, fro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405835090661656&wfr=spider&for=pc>.
- 束開榮 (2020)。〈社交媒體研究的媒介物質性路徑——以微信API開放與使用項目為個案的研究〉。《新聞界》，第5期，頁80-90。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 Shu Kairong (2020). Shejiao meiti yanjiu de meijie wuzhixing lujing——Yi Weixin API kaifang yu shiyong xiangmu wei gean de yanjiu. *Xinwenjie*, 5, 80–90.
- 邵春霞 (2022)。〈數字空間中的社區共同體營造路徑——基於城市社區業主微信群的考察〉。《理論與改革》，第1期，頁47–58。
- Shao Chunxia (2022). Shuzi kongjian zhong de shequ gongtongti yingzao lujing——Jiyu chengshi shequ yezhu Weixinqun de kaocha. *Lilun yu gaige*, 1, 47–58.
- 沈欣悅 (2022年3月27日)。〈上海封控區域現「買菜難」末端運力不足是主因〉。財新網。上網日期：2022年9月23日，取自 <https://companies.caixin.com/2022-03-27/101861926.html?cxw=Android&Sfrom=Wechat&originReferrer=Androidshare>。
- Shen Xinyue (2022, March 27). Shanghai fengkong quyue xian “maicainan” moduan yunli buzu shi zhuyin. *Caixin wang*. Retrieved September 23, 2022, from <https://companies.caixin.com/2022-03-27/101861926.html?cxw=Android&Sfrom=Wechat&originReferrer=Androidshare>.
- 馬汀·德·瓦爾 (2018)。《作為介面的城市：數字媒介如何改變城市》(毛磊、彭喆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原書 de Waal, M. [2014]. *The city as interface: How digital media are changing the city*. Rotterdam: nai010 publishers.)
- Mating De Waer (2018). *Zuowei jiemian de chengshi: Shuzi meijie ruhe gaibian chengshi* (Mao Lei, & Peng Zhe, Trans.). Beijing: Zhongguo jianzhu gongy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e Waal, M. [2014]. *The city as interface: How digital media are changing the city*. Rotterdam: nai010 publishers.)
- 高恩新 (2020)。〈國際災難研究的概念譜系與未來議程：百年反思〉。《社會學評論》，第6期，頁113–126。
- Gao Enxin (2020). Guoji zainan yanjiu de gainian puxi yu weilai yicheng: Bainian fansi. *Shehuixue pinglun*, 6, 113–126.
- 唐士哲 (2020)。〈海底雲端：網際網路的基礎設施探問〉。《新聞學研究》，第145期，頁1–48。
- Tang Shizhe (2020). Haidi yunduan: Wangji wanglu de jichu sheshi tanwen. *Xinwenxue yanjiu*, 145, 1–48.
- 席志武、李輝 (2021)。〈平台化社會重建公共價值的可能與可為——兼評《平台社會：連接世界中的公共價值》〉。《國際新聞界》，第6期，165–176。
- Xi Zhiwu, Li Hui (2021). Pingtaihua shehui chongjian gonggong jiazhi de keneng yu kewe—Jianping *Pingtai shehui: Lianjie shijie zhong de gonggong jiazhi*. *Guoji xinwenjie*, 6, 165–17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孫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平台作為方法：勞動、技術與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第S1期，頁8-24、126。

Sun Ping, Qiu Linchuan, Yu Haiqing (2021). Pingtai zuowei fangfa: Laodong, jishu yu chuanbo.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S1, 8-24, 126.

陳娟、甘凌博(2022)。〈公共衛生防控如何走向共識：一個在線社區傳播的視角〉。《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5期，頁135-142。

Chen Juan, Gan Lingbo (2022). Gonggong weisheng fangkong ruhe zouxiang gongshi: Yige zaixian shequ chuanbo de shijiao.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5, 135-142.

曼紐爾·卡斯特(2001)。《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Castells, M. [2000].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Mannier Kasite (2001). *Wangluo shehui de jueqi* (Xia Zhujiu et al.,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astells, M. [2000].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張振、楊建科(2017)。〈城市社區的空間關係異化：生成機理與治理機制——基於空間生產視角的分析〉。《學習與實踐》，第11期，頁82-88。

Zhang Zhen, Yang Jianke (2017). Chengshi shequ de kongjian guanxi yihua: Shengcheng jili yu zhili jizhi——Jiyu kongjian shengchan shijiao de fenxi. *Xuexi yu shijian*, 11, 82-88.

張磊、賈文斌(2021)。〈互聯網基礎設施研究：元概念、路徑與理論框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5期，頁22-32、145。

Zhang Lei, Jia Wenbin (2021). Hulianwang jichu sheshi yanjiu: Yuangainian, lujing yu lilun kuangjia.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anjiushengyuan xuebao*, 5, 22-32, 145.

閻岩(2021)。〈虛實相間：災後應急群體的數字實踐〉。《新聞記者》，第10期，頁42-51。

Yan Yan (2021). Xushi xiangjian: Zaihou yingji qunti de shuzi shijian. *Xinwen jizhe*, 10, 42-51.

賀霞旭(2019)。〈空間結構類型與街鄰關係：城市社區整合的空間視角〉。《社會》，第2期，頁85-106。

He Xiaxu (2019). Kongjian jiegou leixing yu jielin guanxi: Chengshi shequ zenghe de kongjian shijiao. *Shehui*, 2, 85-106.

斯蒂芬·格雷厄姆、西蒙·馬文(2020)。《支離的城市主義：網絡化基礎設施、技術變遷與城市狀況》(陸萍、胡躍明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原書Graham, S., & Marvin, S. [2002].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Routledge.)
- Sidifen Geleimu, Ximeng Mawen (2020). *Zhili de chengshi zhuyi: Wangluohua jichu sheshi, jishu bianqian yu chengshi zhuangkuang* (Lu Ping, & Hu Yueming, Trans.).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raham, S., & Marvin, S. [2002].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Routledge.)
- 楊錦曦 (2022年4月11日)。〈上海市監局對社區團購限價 團購價格略高於平時〉。財新網。上網日期：2022年9月23日，取自 <https://www.caixin.com/2022-04-11/101868612.html>。
- Yang Jinxi (2022, April 11). Shanghai Shijianju dui shequ tuangou xianjia tuangoujia lue gaoyu pingshi. *Caixin wang*. Retrieved September 23, 2022, from <https://www.caixin.com/2022-04-11/101868612.html>.
- 蔡禾、賀霞旭 (2014)。〈城市社區異質性與社區凝聚力——以社區鄰里關係為研究對象〉。《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133-151。
- Cai He, He Xiaxu (2014). Chengshi shequ yizhixing yu shequ ningjuli——Yi shequ linli guanxi wei yanjiu duixiang. *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133-151.
- 熊易寒 (2019)。〈社區共同體何以可能：人格化社會交往的消失與重建〉。《南京社會科學》，第8期，頁71-76。
- Xiong Yihan (2019). Shequ gongtongti heyi keneng: Rengehua shehui jiaowang de xiaoshi yu chongjian. *Nanjing shehui kexue*, 8, 71-76。
- 劉戰偉 (2022)。〈突顯甚麼？遮蔽甚麼？——作為隱喻的「平台」：連接、中介與基礎設施〉。《新聞記者》，第8期，頁54-66。
- Liu Zhanwei (2022). Tuxian shenme? Zhebi shenme?——Zuowei yinyu de “pingtai”: Lianjie, zhongjie yu jichu sheshi. *Xinwen jizhe*, 8, 54-66.
- 澎湃新聞 (2022a年3月27日)。〈上海關於做好全市新一輪核酸篩查工作的通告〉。微信。上網日期：2022年9月21日，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OWPJO6VL7aHIRgX6Z1piWA>。
- Pengpai xinwen (2022a, March 27). Shanghai guanyu zuohao quanshi xinyilun hesuan shaicha gongzuo de tonggao. *Weixin*. Retrieved September 21, 2022,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OWPJO6VL7aHIRgX6Z1piWA>.
- 澎湃新聞 (2022b年5月30日)。〈6月1日零時起，上海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微信。上網日期：2022年9月21日，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groYVxmdPZefsDEOB1VFUg>。
- Pengpai xinwen (2022b, May 30). 6 yue 1 ri lingshi qi, Shanghai youxu huifu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7期(2024)

- zhuzhai xiaoqu churu, gonggong jiaotong yunying he jidongche tongxing. *Weixin*. Retrieved September 21, 2022,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groYVxmdPZefsDEOB1VFUg>.
- 謝靜 (2015)。〈社區：傳播的構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32–40。
- Xie Jing (2015). Shequ: Chuanbo de goucheng. *Su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32–40.
- 謝靜 (2019)。〈私社區：移動新媒體時代的自我、他人與地方〉。《南京社會科學》，第1期，頁109–116。
- Xie Jing (2019). Si shequ: Yidong xinmeiti shidai de ziwo, taren yu difang. *Nanjing shehui kexue*, 1, 109–116。
- 簡·雅各布斯(2006)。《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紀念版(第二版)》(金衡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Jian Yagesi (2006). *Meiguo dachengshi de si yu sheng: Jinianban (Di er ban)* (Jin Hengshan,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hmad, F., Chowdhury, R., Siedler, B., & Odek, W. (2022). Buil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during COVID-19: Learning from rural Bangladesh.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30(3), 327–338.
- Aldrich, D. P., & Meyer, M. A. (2015).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9(2), 254–269.
- Amin, A. (2008). Collective culture and urban public space. *City*, 12(1), 5–24.
- Anand, N. (2011). Pressure: The politechnics of water supply in Mumbai. *Cultural Anthropology*, 26(4), 542–564.
- Andreessen, M. (2007, September 16). The three kinds of platforms you meet on the Internet [Blog post]. Retrieved September 14, 2022,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1002031605/http://blog.pmarca.com/2007/09/the-three-kinds.html>.
- Chen, Y., Mao, Z., & Qiu, J. L. (2018). *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 Chu, H., & Yang, J. Z. (2020). Building disaster resilience using social messaging networks: The WeChat community in Houston, Texas, during Hurricane Harvey. *Disasters*, 44(4), 726–752.
- Dewey, J. (1946).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n essay in political inquiry*. Gateway Books.
- Edwards, P. N. (2003). *Infrastructure and modernity: Force, time, and social*

-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 T. J., Misa, P. Brey, & A. Feenberg (Eds.),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pp. 185–226).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Fransen, J., Peralta, D. O., Vanelli, F., Edelenbos, J., & Olvera, B. C. (2022). The emergence of urban community resilience initiativ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ory stud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34(1), 432–454.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Imperiale, A. J., & Vanclay, F. (2016). Experiencing local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action: Learning from post-disaster communit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7, 204–219.
- Jackson, S. J., Edwards, P. N., Bowker, G. C., & Knobel, C. P. (2007). Understanding infrastructure: History, heuristics and cyberinfrastructure policy. *First Monday*, 12(6), n.p.
- Jones, H., Neal, S., Mohan, G., Connell, K., Cochrane, A., & Bennett, K. (2015). Urban multiculturalism and everyday encounters in semi-public, franchised cafe spac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3(3), 644–661.
- Klinenberg, E. (2015).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linenberg, E. (2018). *Palaces for the people: How social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ght inequality, 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vic life*. Crown.
- Koch, R., & Latham, A. (2012). Rethinking urban public space: Accounts from a junction in west Lond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7(4), 515–529.
- Kostof, S. (1992). *The city assembled: The elements of urban form through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1), 327–343.
- Latham, A., & Layton, J. (2019).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public life of cities: Studying urban sociality and public spaces. *Geography Compass*, 13(7), e12444.
- Lawhon, M., Nilsson, D., Silver, J., Ernstson, H., & Lwasa, S. (2018). Thinking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frastructure configurations. *Urban Studies*, 55(4), 720–732.
- Layton, J., & Latham, A. (2022).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life—notes on Finsbury Park, London. *Urban Geography*, 43(5), 755–776.
- McFarlane, C., & Silver, J. (2017). Navigating the city: Dialectics of everyday urban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2(3), 458–471.
- Norris, F. H., Stevens, S. P., Pfefferbaum, B., Wyche, K. F., & Pfefferbaum, R. L. (2008).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1(1), 127–150.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67 期 (2024)

- Oliver-Smith, A. (1999). What is a disaster?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 persistent question. In A. Oliver-Smith, & S. M. Hoffman (Eds.), *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pp. 18–34). New York: Routledge.
- Plantin, J.-C., & de Seta, G. (2019). 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3), 257–273.
- Plantin, J.-C., Lagoze, C., Edwards, P. N., & Sandvig, 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1), 293–310.
- Quarantelli, E. L. (1960). Images of withdrawal behavior in disasters: Some basic misconceptions. *Social Problems*, 8(1), 68–79.
- Quarantelli, E. L. (1987). What should we study? Ques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ers about the concept of 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5(1), 7–32.
- Quarantelli, E. L., & Dynes, R. R. (1977). Response to social crisis and disaste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23–49.
- Star, 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77–391.
- Twigg, J., & Mosel, I. (2017). Emergent groups and spontaneous volunteers in urban disaster respons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9(2), 443–458.
- Ullberg, S. B., & Warner, J. (2016). The relevance of soft infrastructure in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isk reduction. *UN Chronicle*, 53(3), 23–26.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UNDHA; 1992). *Internationally agreed glossary of basic terms related to disaster management*. Geneva: UNDHA.

本文引用格式

楊涵庚、王琢玉 (2024)。〈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上海疫情期間社區團購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7 期，頁 91–120。